

雪里的作文课

■ 郭菲霞

四年级的那个下雪天，我其实并不知道，自己正坐在人生里最奢侈的一堂文学课上。

预备铃刚过，孙老师嘴角挂着神秘的笑走了进来，说：“今天咱们不讲课文，去操场！”全班先是愣住，紧接着抑制不住地欢呼，大家推搡着挤出门，扎进了那场漫天大雪里。

孙老师让我们围成一个圈，她站在中央大声说：“今天要写作文，题目就叫《雪》。怎么写需要自己去找。”她边说边将一把雪揉成一个坚实的团，然后摊开那双被冻得通红的手，鼓励我们：“别怕冷。如果不去摸一摸，写出来的字就没有温度。来，告诉我，雪摸起来什么感觉？”

“是凉的！”有个男生喊道。

“很喧腾，像棉花糖！”一个女生轻声说。

我也忍不住插了一句：“软塌塌的，但又有点扎手。”

孙老师笑了：“说得好，这就是触觉。”接着，她示意大家安静，让我们闭上眼去听。

操场上安静了一瞬，很快，一种极轻的沙沙声在耳边响起，像无数只蚕在啃食桑叶，又像是有人隔着梦境跟你说悄悄话。脚步偶尔挪动，雪层裂开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嚼碎冰。

“听到了吗？”孙老师的声音在风里听着很空灵，“雪是有声音的。把这些声音写进去，你的文章就有有了呼吸。”

那堂课简直是一场感官的盛宴。我们仰起头，看雪花是怎么打着旋儿掉下来的，当它们挂在睫毛上，

视线变得毛茸茸、雾蒙蒙。孙老师甚至让我们去闻、去尝。我使劲吸了吸鼻子，空气里有一种冷冰冰的，像铁锈又像薄荷的味道。调皮的小强舔了一口手里的雪球，结果被冻得龇牙咧嘴：“老师！雪怎么有股土腥味啊？”

全班哄堂大笑。孙老师笑着点头：“雪本无味，若是沾了土，便有了泥土味。这就是味觉和嗅觉。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，写你自己的感受，文章才会有自己的味道。”

那天，孙老师带着我们在雪地上看松树，观察远山。以前写雪，我们总爱用“银装素裹”“白茫茫一片”这种形容。但那天我才发现，雪不是一下子把世界刷白的。它是一层一层很有耐心地压在松枝上。远处的山也不是纯白，而是一种有层次的灰蓝，随着雪越下越大，那种灰蓝渐次隐退，直至被白色彻底覆盖。

回到教室时，大家身上都冒着热气，头发湿漉漉的。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写作文不是在“挤牙膏”，字句像融化的雪水一样，顺着笔尖自己流了出来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明白，孙老师那天教的远不只是“五感写作法”。现在的我，在为生计奔忙的间隙，偶尔会停下来，欣赏一朵花的开落，或者在雨后初晴时，贪婪地闻一闻泥土的味道。这种对生命的敏锐觉知，从枯燥生活里抠出美感的能力，都源于30年前那堂作文课的启蒙。

那场雪下在很多年前，却至今未曾在我的生命里消融。它幻化成无数晶莹的碎片，镶嵌在我记忆的深处，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。

与时间对坐

■ 王承舜

每到岁末，我总会不自觉地整理手机相册。

手指划过上千张照片：会议PPT的边角、加班的深夜、随手拍的路边花草、数不清的外卖……它们零碎、杂乱，就像小时候玩过的乱序拼图。我试图拼出一个完整的“今年”，却发现记忆连个边角都对不上。这时候我才觉得，时间在手机里，好像只是一点点被“吃”掉的内存。

我们常说时间如流水，可在当下的更多时候，它只是不断刷新的信息流。从早到晚，我们被各种消息推送填满空隙，从醒来睡到睡前，屏幕的光总映在脸上。这种“永远在线”，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抓住了全部时间。可到了年底回头一看，又觉得两手空空，似乎什么都没留下。

不是时间没了，是我们感受时间的能力变钝了。昨天和今天没什么区别，春天和秋天好像也差不多。日子变成了一本被风乱翻的书，只听见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，却一个字也没看清。我们就像坐在一趟高速列车上，窗外的风景连绵成一片模糊的色带，分不清是稻田、房舍，还是远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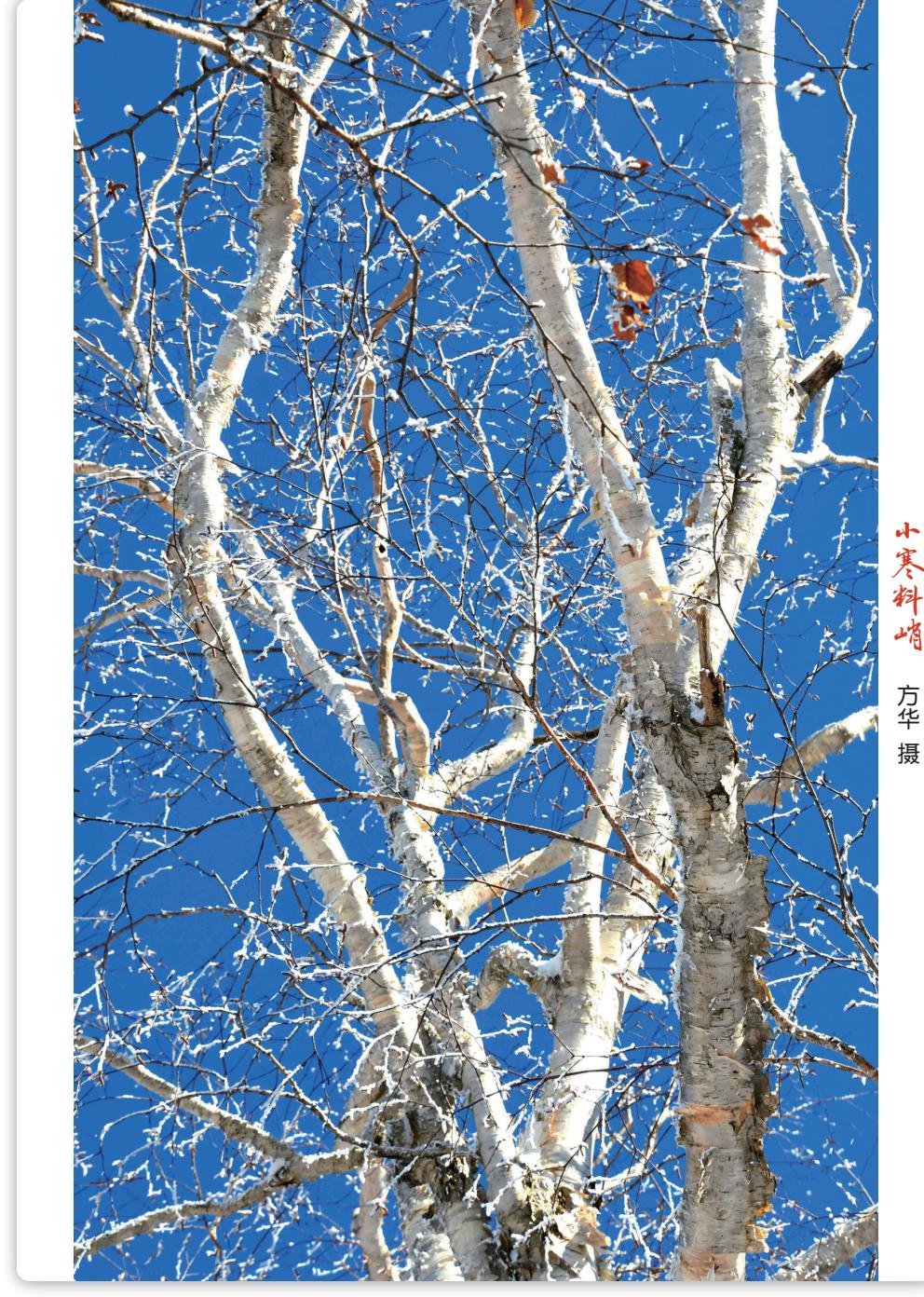
岁末，是时间这趟列车一次温和的到站广播。

我不得不下车，站在“今年”和“明年”之间的站台上。喧闹暂时退去，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于是，我第一次真正与时间，那个被日常琐碎覆盖的、沉默的伙伴对坐。

这场对坐，安静而诚实。

我看到的，是那些没被修饰的痕迹。不是朋友圈里精心修饰的9张图，而是外卖订单——原来2025年点了这么多宵夜，买了这么多次褪黑素；不是音乐app给我贴上的“深夜诗人”标签，而是那个我总在失眠时打开、听到睡着的播客节目；还有和好朋友的聊天记录，往上翻啊翻，发现上次认真聊天，已经是夏天的事了。

遗憾，在这一刻变得具体。不是

小寒料峭
方华摄

把春天藏在期待里

■ 潘玉毅

什么“岁月匆匆”，而是心里那一声“唉”——“我怎么活得如此潦草？”关注了全世界的悲欢，却忽略了身边人的眼神；保存了许多远方的风景，却记不起昨天傍晚的云是什么形状。时间不说话，只是把你“不在场”的证据，平静地摊开。

然而，当我看着这些“错过”时，新的体悟开始生长。

我忽然明白，在这个被屏幕占据的时代，“与时间对坐”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抵抗。是主动关掉无穷的推送，选择片刻的发呆；是拒绝被下一件事召唤，在上一件事结束后多坐一会儿；是把注意力从虚拟世界的点赞，收回至一杯茶的温热、一阵风的清凉、一次完整的对话。

时间偷走了我们的一些东西，但好像也留下了什么：一种从喧闹中抽身后的，更敏锐的感知力。那些“差一点”和“来不及”，像砂纸一样，磨掉了我们身上一些浮躁的东西。让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东西——对美的感受、对爱的需要、对意义的追问——渐渐清晰。我开始能分清，什么是信息，什么是体会；什么是热闹，什么是充实；什么是被算法安排的欲望，什么是内心真正的声音。

与时间对坐，不是要追回错过的每一刻，而是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。

新年总要到来。我们很快又会被推回那趟列车。但或许，在接下来的飞驰中，我会偶尔想起这个对坐的下午。于是，我会在通勤路上放下手机，看看地铁里人们的表情；会在周末上午，推掉一个可有可无的聚会，陪家人好好做顿饭；会在一项工作完成后，不急着开始下一项，给自己5分钟，什么也不做。

与时间对坐，其实是练习“在场”。在岁末的安静里，我重新校准内心的时钟。然后，带着这份重新找回的“知觉”，走进依然会忙碌的新时光。或许，往后的日子里，当别人都在追问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，我终于可以说：至少这次，我站在了时间里。

周末，和往常一样，早上7点，外面天色未明。我起身为孩子们准备早餐，先把小米、藜麦、黑米掺上白米淘洗干净，再放进电饭煲里，调到煮粥模式。又炒了盘鸡蛋，拌了一小碟凉菜，于是，一顿简单的早餐便妥当了。

8点半，孩子们洗漱完毕，坐上了餐桌。大女儿忽然一声尖叫，丢下筷子。我问她怎么了。她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，粥里有虫子。”我接过她的碗一看，靠近碗壁的米粒旁边真有一只小虫，米粒一样长短，细扁的身子是白色，带着一道一道的环。

我心里清楚——这是米虫。小时候吃饭时，我也常在碗中与它相遇。那时的我同女儿反应如出一辙，可我的母亲总会迅速把虫子夹走，还带上一小团饭粒，笃定地对我说：“这不是虫，你看，是饭，你看花眼了。”这情景，总让我想起《围城》里的妙笔——方鸿渐在餐馆吃饭，发现肉里有虫子，店家推说是“肉芽”。

此刻，我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，不动声色地将那虫子捞起，没让女儿再看第二眼。我与丈夫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侧身避开孩子的视线，眨着眼问他：“你看，这不是虫子吧？”他会意地接话：“不是，这是藜麦发的芽。”女儿半信半疑：“真的吗？给我看看。”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，迅速抽了张纸巾，把虫子捏了进去。

离时近时远，温度自然也是不一样的。唯有一点是相同的，“近乡情更怯”，随着春节愈来愈近，这股暖意与日俱增。

城市里，马路两边的树枝已被园艺工人修剪得差不多了，遇着冰冻之年，行道树们还常常被刷上一层层白剂，裹上一件件“保暖衣”。在我们这里的农村，靠手艺吃饭的木匠、瓦匠、泥水匠们也都陆陆续续地停下了营生，跑到山上给杨梅树施肥，天气虽冷，几锄头挥下来，身体便开始发热了。竹林里，挖笋的人们将林子翻了一遍又一遍，放眼望去，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处平整的地面。神奇的是，依旧有人来，依旧有笋可挖。或许，山也是温暖的，正如小寒给人的感觉。

唐人元稹有“小寒”题材诗，尾联云：“莫怪严凝切，春冬正月交。”这种季节的变化，人的肉眼难以识别，但心中慧眼可识万物，只要一提起小寒，人们便知道春天近了。于是，即便肌肤上感受到的是阵阵寒风，脑海里呈现的却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世界。

偶尔，疏疏密密地下一场雪，白居易那首诗便自脑海里跑了出来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小寒，把冬天捂在了守候里，把春天藏在了期待里。

见女儿依然不肯喝粥，我宽慰她：“其实在从前，米虫也能吃，还能补充蛋白质呢。”女儿立刻嚷起来：“谁会吃这个啊！”我硬着头皮说：“真的，我小时候就吃过。”她惊讶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，你没看电视里有些地方的人吃虫子吗？竹虫、蜂蛹都能吃。”女儿连连摇头：“我才不吃。”

我又给她重新盛了碗粥。她盯着碗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端起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，眼睛还时不时瞟一下粥面，好像在确认着什么。最终，她还是喝完了。放下碗时，她轻轻叹了口气，那模样顿时让我心头一软。

回头想想，我平时教女儿要诚实，可为了驱散她的恐惧，担心她宁肯饿肚子也不吃饭，我竟编出自己也吃过这虫子的故事，想想也好笑。

小时候，母亲掩饰虫子的存在，我却据理力争，非说那是虫，甚至赌气不肯再吃饭。似乎当了妈妈之后，我害怕的东西越来越少了。不怕虫，不怕高，力气也好像变大了。小时候怕的，如今因为孩子，都不怕了。

窗外的天早已大亮，晨光透过厨房窗户，在餐桌上铺开了一片暖色。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也能变得这样勇敢，也能像我和我母亲那样，告诉她的孩子“那不是米虫，只是一粒米”——也或许，她会有更好的办法，让孩子不再害怕碗里那只小小的虫。

“回来了”

■ 陆锋

小时候，是奶奶守着这个家。

记忆里的老房子，有种被岁月浸润的鲜亮。尤其是夏天，门外的花十分热闹：一串红挨挨挤挤地开着，像谁撒了一地的红爆竹，炸出满院子的喜庆；凤仙花藏在叶间，粉的、紫的，小姑娘似的，怯怯地探出头来；梔子花开得层层叠叠的，香气浓得能染透衣裳，路过的风都要在这里打个转，才舍得离开。奶奶就坐在门内的阴影里，做着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零碎活计——剥豆子，或是扎烧火用的草把子。她的身影，被光阴浸润得湿润而安详，像一枚被摩挲了许久的玉石，妥帖地安置在家的中心。于是，那一声“回来了”，便成了这个家每日里固定两次的、最温暖的节律。

先是。放学的路总是拖得长长的，和同学追逐嬉闹到肚皮咕咕作响才想起回家。推开那扇虚掩着的、沉沉的木门，还没来得及看清屋内的情形，奶奶的声音便悠悠地传过来：“回来了？”

于我，这声音便不仅仅是问候，更是一道“赦令”。它意味着我可以卸下肩上的书包，也卸下那一整天在学校里不得不端着的、属于“好学生”的规规矩矩。我会响亮地、几乎是雀跃地应一声：“奶奶，我回来啦！”这一声“回来啦”，是终于可以自由呼吸的、小小的胜利。

然后是父母。路上传来零零落落的自行车铃声，奶奶的耳朵仿佛自带一种筛选的功能，能从一片嘈杂里，准确地辨出母亲的自行车声，或是父亲的脚步声。她并不立刻起身，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微微侧着头，像一只警觉而又安闲的老猫。等到那脚步声真切地到了门口，她才不紧不慢地迎上去，对着一身倦意的人，轻轻地说一句：“回来了。”

那声音是干燥而温暖的，像是晒过了好几个太阳的棉被，拂去了父母肩头从外面带来的、看不见的尘埃与疲累。母亲会一边停车，一边应声：“哎，回来了。”父亲则通常点点头，脸上松弛下来。这一问一答之间，仿佛完成了一个郑重的交接仪式——将外面的世界关在门外，将家的暖意盈开来。

后来，我像一棵被风催着远行的蒲公英，离开了家。

再后来，奶奶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，熄灭了她的光。

于是，父母顺理成章成了守着这个家的人。

起初，我是不习惯的。下班回家，掏出钥匙开门，屋内常常是安静的，只听见厨房里炖汤的“咕嘟”声，或是电视机里的说话声。常常是我在玄关站了好一会儿，才被父母发现。他们总是怔愣片刻才会补上一句：“哦，回来了。”

这一声“回来了”，与奶奶的那一声，是如此不同。它不再是一个仪式开始的宣告，而像一句匆忙的、日常的确认。

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？或许是在那个加班至凌晨的冬夜——车还未拐进小区就看见父亲守候在路灯下的身影，他朝我走来，一声“回来了”说得缓慢而用力，话音里是欲打电话又怕惊扰终于安下心来的庆幸。又或许是每个晚归的时刻，客厅的灯总会亮着一盏，父母靠在沙发上打着盹儿，听见门响，立刻惊醒，那句“回来了”里带着未褪尽的睡意与全然的放松。

守候，从未改变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穿越时光，看到了多年前在老屋里等我的奶奶。守候的人，从奶奶变成了父母；归来的对象，从父母与我，变成了我。那一声“回来了”，却穿越了漫长的岁月，以不同的腔调，承载着同样厚重的牵挂，在这人间的屋檐下，生生不息地回响着。至此，这一声“回来了”，它不再是我童年时那无忧无虑的“赦令”，而变成了一根细细的、却无比坚韧的丝线，一头系着父母日渐迟缓的行动，一头系着我忙碌的身躯。它是在确认，确认他们的等待没有落空，确认我依然平安地、准时地回到了这个由他们守护着的、小小的港湾。这声问候里，有他们全部的寄托与小心翼翼的依赖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门打开，我率先开口，像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般郑重。

我知道，这句话会落进这屋子的角落里，落进他们均匀的呼吸里，落进了我们共同拥有的、未来的每一个晨昏里。

我回来了。

不再是被动地被告知，而是主动地宣告，宣告此身有所栖，此心有所归。